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历史考察

史秋菊, 陈 建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德国社会民主党走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 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一变化对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性质经历了从“阶级革命党”到“议会改良党”, 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 从追求“制度社会主义”到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演变。其总体趋势是社会民主党的“非工人阶级化”和“去意识形态化”, 日益由一个争取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党逐渐演变为一个以参政执政为目的的选举党。

[关键词] 德国社会民主党; 阶级党; 人民党; 全方位政党; 传媒党

[中图分类号] D73/77(156)64; K5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5-0069-06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HI Qiuju, Chen Jian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has experienced a half century of ups and downs and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al structure. This change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its nature has evolved from “Class Revolutionary Party” to “Parliamentary Reform Party”, from “People’s Party” to “Catch – all Party”, from the pursuit of “institutional socialism” to “value socialism”. The overall trend is the SPD’s “non – working class” and “non – ideology”. The SPD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revolutionary party fighting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to an election party aiming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or hold power.

Key words: SDP(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Class party; People’s party; Catch – all Party; Media party

如今已走过 150 年风雨历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是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政党, 同样也是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这个从不甘心安于现状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不断地发生着顺应时势和外部环境的周期性转型, 这也成为 20 世纪的一个新的政治现象, 调整和改革似乎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内在的性格特征。“回顾欧洲政治发展的左翼历史, 它实际上已在政治和社会现实变化的压力下进行了几次改造。”^{[1]7} 从“革命党”到“改良党”, 从“工人(阶

级)党”到“人民党”, 从追求“制度社会主义”到追求“价值社会主义”, 再到放弃社会主义目标, 以努力争取社会中间阶层的全方位政党和以选举为目的的传媒党的演变, 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

一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阶级革命党

(一) 革命政党的初步建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作为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亲自指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在

收稿日期: 2014-04-18

作者简介: 史秋菊(1989-), 女, 山东淄博人, 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陈 建(1972-), 男, 江苏睢宁人, 南京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着极强的革命性,其历史源头可上溯到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其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宣称这是一个代表“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努力消除“社会的阶级对立”的工人联合组织。1869年,工人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森纳赫领导下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两个政党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力量迅速壮大。但是《哥达纲领》“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2]的改良主义倾向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执笔书写了战斗檄文——《哥达纲领批判》,彻底清算了拉萨尔机会主义倾向。由于该党赞成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俾斯麦即宣布该党非法,并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严厉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愈镇压,愈反抗,愈革命,愈使“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不证自明,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抗思想和革命热情愈是强烈。多次被捕入狱的倍倍尔愤而怒言说:“我要像你们当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你们!”^[3]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新纲领——《爱尔福特纲领》

1890年9月,随着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共同起草的新纲领——《爱尔福特纲领》。该纲领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所造成的危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可怕”,“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有目的地运用和充分发展生产资料已经互不相容”。^{[4]20}因此,只能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4]20-21}由此可见,《爱尔福特纲领》在理论上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一致的,一边是不劳而获、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边则是劳而无获、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天然对立使社会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而这一斗争“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

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经济斗争,不能发展他们的经济组织,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利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4]21} 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便是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塑造成为一种有觉悟的和统一的斗争”,^{[4]21} 从而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纲领在实际政策方面提出了普选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一系列无产阶级争取“合法”斗争的要求,这显然是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默许和认同。一方面是对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革命性目标,另一方面又是争取“合法”斗争的改良主义倾向,这为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改良主义大行其道埋下了伏笔。但从总体上说,《爱尔福特纲领》仍是以追求制度社会主义为革命目标,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

二 从阶级党到人民党——改良主义思想的逐步确立

(一)《格尔利茨纲领》——社会民主党阶级性、革命性的松动

1914年,声称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略口号,选择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同意进行战争预算,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与战前的反战原则相比,无疑是背道而驰。社会民主党的这一举动显然也与马克思“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这一论断大相径庭,这无疑是与统治阶级的合作,是对现有国家和政治体制的认同。在这一问题上,党内出现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流,对战争预算持反对态度的少数派与统治阶级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年)分离出来,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则选择融入现存体制,与统治阶级合作甚至结盟。

正因为对统治阶级采取合作态度,使得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到1930年间多次执掌政权。期间,通过了伯恩斯坦起草的新纲领《格尔利茨纲领》(1921年),这一纲领开始对改良主义思想接受吸收态度,以改良主义的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力图通过现存制度内的行动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5]

首先,纲领开篇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4]143}这无疑淡化了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可以说这一论调是将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党”转变为“人民党”的初步尝试。

其次,如果说《爱尔福特纲领》对资本主义制度仍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那么新党纲则变为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伦理学论证。新纲领宣称“资本主义经济”使“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道德的要求”,^{[4]33}这一伦理学的论证表明社会民主党为争取更广泛的社会集团而必须去争取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目标,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这一有限的妥协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地位的动摇。

第三,在目标上该纲领虽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方法上却力图以改良主义的议会斗争道路替代流血暴力革命道路。

第四,纲领还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并将其作为社民党的奋斗目标,断言“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是一条破坏的道路”,“只有建设的道路才能稳妥地通往社会主义。”^[6]这条“建设的道路”就是通过“民主”方式和“合法”斗争的议会改良道路。

通过《格尔利茨纲领》,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合法化了。但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仍追求“制度社会主义”,^[7]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至关重要的经济制度问题上,依然毫不含糊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性质上讲依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二)《哥德斯堡纲领》——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跨越

二战后,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从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次参加选举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得票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同时,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也大幅下降,1958年党员人数与1947年相比下降了将近30%。几次大选失败使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位置,由此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党

的改革的大讨论,讨论的最终成果即是一个新的纲领——《哥德斯堡纲领》(1959年)的通过,这一纲领引起了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大转折。

该纲领宣称其“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一个人民的政党”,^{[4]84}开始变为改良主义的全民党。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该纲领作了如是调整:“民主社会主义根植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这无疑已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的地位,将党的指导思想的触角伸向伦理教义和精神哲学,表明党的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趋向已经完全确立。纲领还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人们信仰的内容,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国家有权规定的”。^{[4]70}除此之外,纲领还把“自由”“公正”“团结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是以抽象的伦理道德价值目标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革命目标。实现这一基本价值的途径便是“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以便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建设国家和社会”。^{[4]72}这彻底切断了理论方面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点藕断丝连的历史渊源。在经济领域,新纲领主张混合经济,调和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方面,保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接受国家宏观调控,改进国家福利制度,保证全民就业,保障公平分配等。不再坚持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承诺,实际上就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接受和认同。

“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褪去其“工人阶级党”的外衣,作为更广泛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达成了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正式转型。

(三)从阶级党到人民党的原因略探

首先,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潜滋暗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施坦可以说是改良主义的始祖,他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以及西欧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提出了改良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前提已经改变……在目前社会中已经有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社会主

义”。^{[8]9}“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从此成为修正主义的格言风行一时,他的目的就是放弃暴力革命,最终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根据伯恩斯坦的分析,认为“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8]104}这表明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两大阶级尖锐对立的情况,这一前提成为伯恩斯坦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一改良主义路线,努力争取议会斗争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直至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已经开始合法化。正如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所指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信奉“修正主义”,“并不是由于人们有意识地传播修正主义的看法,而是来自党本身的经验”。^[9]

其次,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中等阶层逐步发展壮大。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伯恩斯坦认为“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不如说它是无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化了”,^{[8]105}就在工人阶级内部也表现出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差异等方面的内部分化,而中等阶层又得到公务员和职员等“新中间阶层”的补充。社民党主席舒马赫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原意已有所改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事情了。”一边是中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一边是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缩水,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显然已经无法吸引社会结构中的大多数群体,只依赖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这一稳固群体赢得大选胜利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若不对这一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它就不可能获得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执掌政权,而要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党的纲领做出新的解释。因此,以争取大多数选民,扩大阶级基础的新纲领便应运而生,也一步步使社会民主党“非意识形态化”和“非工人阶级化”。

三 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

(一)《柏林纲领》——顺应时代新要求的生态纲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开始起步,联邦德国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一样,第三产

业已占据经济发展进程的主导地位,相应的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也已经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哥德斯堡纲领已然无法解释新的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情况。

另一方面,“战后出生长大的‘新中产阶级’,属于后物质主义的一代,他们热衷于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与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与其它中产阶级成员也有所区别。”^[10]它开始改变部分德国政治关注的日程和选举行为。1980年,绿党成立,吸引了大量中左选票,面对这一形势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应似乎有些迟缓,直到1983年它再度沦为在野党。

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一度将“新社会运动”的活跃看作一个不小的政治挑战。随着新社会运动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绿党作为一支号称“反对一切政党的政党”在德国迅速发展壮大,许多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选民在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下选择“弃红投绿”。因此,在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吸取“新社会运动”的内容,寻找与“新社会运动”的共同点,顺应时代要求的新纲领——《柏林纲领》(1989年)应运而生。这一纲领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新的转型,它在保留“自由”“公正”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增加了生态保护等内容。这一纲领的出台虽未立即改变社会民主党沦为在野党的局面,在1994年大选中仍败于联盟党,但却使社民党学会了如何与其他政党合作,尤其是与绿党的合作,为其日后“红绿联盟”奠定了基础。

(二)“新中间道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

在《柏林纲领》之后,1994年社会民主党大选落败,其领导人沙尔平呼吁对党的路线方针需再作修改。他认为“社民党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纲领,通过更加团结来改善对外形象,而且首先必须对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11]在之后的竞选纲领中,随之提出了“新中间道路”。实际上,施罗德提出的“新中间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选举标签,旨在引发大众媒体的积极回应,使社会民主党能深入到中产阶级范围之内。这一“新中间政策”,被认为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既“非左”又“非右”的道路选择力

求超越意识形态,淡化左右之争,兼容并蓄地将各种意识形态糅合在一起,形成所谓“超越左右”的混合物。社民党对“新中间”的定义是:“社会中的‘主要成员’,是指那些有较高素质的、目标明确的人,他们可以承担在家庭中的责任、使孩子接受学校教育,他们是有远见的、忠诚的经理人和企业主,是善于创新的手工业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是那些勇于创业的人,进取的技工和科学家和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他们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我们与所有这些人一起,构成了德国的‘新中间’。”^{[1]183}可以看出,这一定义外延庞杂、内含不定、十分模糊,各阶层利益差别很大,几乎社会所有人都包括在内。这种运动口号的创造,成功地影响了德国选民,社民党力求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自己更加开放、更为包容的一面,以表明社民党不仅代表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利益,同时也坚决捍卫以中产阶级成员为主体力量的社会各阶层利益,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由人民党向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的转变。

(三)从人民党到全方位政党的原因

选民的非固定化和固定选民的丧失,使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社民党进行新一轮转型的重要因素。正如迈尔所言,“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选民的分化程度始终比广泛传播的以‘工人党’为主题词的简单解释模式所愿意承认的要大。”^{[12]64}就社民党的党员成分来看,它除了传统的手工工人外,也包含企业中小职员、小独立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一战后,社会上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和世俗伦理的取向外,也出现了宗教取向。”^{[12]65}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并非是完全同质的。

上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选民固定数量占全部选民的80%,但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却降到原来的一半。所以,变化不定的选民很大程度上对选举的结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有一部分选民,他们自己本身也难以确定自己较为稳定的政治方向,基本上依靠大众媒体中显示的政治论题及象征性的政党领袖来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这种不如说是以肤浅的交往效应为基础的意见形成能够随着任何一种新的情绪状态而迅速改变”。^{[12]70}这

类变动不定的选民在年轻群众中居多,他们容易因外界影响而发生价值变化,容易因为失望、悲观、政治失误甚至是对领袖个人形象的厌恶而影响其政治选择。这种情绪化的投票行为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社会民主党最容易失去的一个投票群体。这类非定向选民,只能在各次选举中根据竞选领袖对某些具体政治方案所作的规划来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他们只能越来越少地指望固定选民(传统的产业工人群体)的支持,不得不依据具体情况,通过不断的有效接触重新整合这些分化的群体,以便在大选中获得他们的支持,为了赢得选举,甚至不惜推行“传媒政治”,成为“传媒党”。

可见,他们再也不能依靠那些长期保持不变的政治目标来要求中下阶层群体对它们表示忠诚和支持,社民党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尽可能多地吸引支持者集团,为此不惜放弃以往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政策主张。

四 选举党的总趋势——传媒党

(一)新传媒时代的政党新生态

在当代,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政党的运行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迈尔所说,“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媒体来进行。”^[13]社会民主党作为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不仅是一个理论大党,更是一个传媒大党,传媒活动始终是它政治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媒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谁是政党领袖,谁掌握了媒体,谁就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和热捧,谁就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着“媒体总理”称号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将社民党推向“媒体制造”道路的首推者。1998年大选时,社民党内部对于让拉封单还是施罗德来担任总理候选人难以抉择。然而正是施罗德擅长与媒体沟通交流互动,在媒体世界中游刃有余,广受媒体青睐,才代替拉封单成为社民党党主席。他抗洪时的“雨鞋政治”及由他提出的德国历史上首次电视辩论也广受媒体赞扬。深谙媒体兴趣所在,符合大众媒体口味的党领袖也使社民党一举夺得执政地位。

(二) 传媒党趋势的原因

其实,对于大多数政党来说,它最重要的目标便是谋求执政,只有成为执政党,它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推行和发挥。要想获得执政权,首要就是赢得大选。而要赢得选举,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受到更多人群的青睐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吹捧。所以,以执政为目的的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促使社民党必须充分尊重广大选民和大众媒体的口味,并以此为导向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包容开放的领袖形象和政党形象。

作为选举党,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使得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只剩下一个空壳,从“阶级党”到“人民党”再到“全民党”和“传媒党”的转型让我们看到了政党在政治选举中的嬗变本色,然而这也未必是它们的一厢情愿,更多的是政党演变的一个必然选择。对于政党实用主义的演变,现在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开始向“传媒党”方向发展,政党的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为选举服务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它切实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根据科技革命发展、社会结构变革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断地调整自身而最大限度的适应新形势、新状况。尽管我们说社会民主党已经抛弃了它原有的阶级属性,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与其对手政党相比,它仍较多地反映中下层民众的要求,更多地代表了领薪职员和其他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在“新中间”道路上仍然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左翼政党。

参考文献:

- [1] 史志钦. 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 [2] 雅克·德罗兹. 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M]. 时波,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49.
- [3] 布劳恩塔耳. 国际史: 1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307.
- [4]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M]. 张世鹏, 译. 殷叙彝, 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王 军.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战后德国政治[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999(1): 70-79.
- [6] 王学东. 一个老大政党的与时俱进——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从工人党变成人民党的[J]. 南风窗, 2004(9): 43-45.
- [7] 罗云力.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演化与其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6): 89-95.
- [8] 爱德华·伯恩斯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 殷叙彝, 译.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65.
- [9] 托马斯·迈尔, 等. 论民主社会主义[M]. 刘芸影, 等,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7: 59.
- [10] 王存福. 论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J]. 德国研究, 2006(2): 29-35.
- [11] Die Welt[J]. 伍慧萍, 摘译. 德国快讯, 1995(1): 2-2.
- [12] 托马斯·迈尔. 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M]. 殷叙彝,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3] 托马斯·迈尔, 郭业洲, 陈林. 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0(6): 4-13.

责任编辑: 骆晓会